

精神世界的发掘

——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

姚明强

施蛰存(1905—)在表现都市社会的现代色彩时,偏重以心理分析来发掘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他先后接受了显尼志勒、蔼理斯和弗洛伊德的影响,大胆探索在性心理,尤其是变态性心理和精神缺损型怪异心理等精神领域里文学表现的可能性,并取得相当突出的成绩,从而在三十年代的中文坛上,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表示了一个新的倾向”。①

一、施蛰存的小说创作

三十年代,是施蛰存小说创作的高峰期,他的代表性作品,均在该期完成。其中,能够比较集中反映他在心理分析方面的创作特色,以及表现这种风格嬗递变化情况的作品,主要有《娟子姑娘》(1928)、《上元灯》(1930)、《将军底头》(1932)、《梅雨之夕》(1933)和《善女人行品》(1933)等小说集。

《娟子姑娘》系作者早期的模仿习作,对其艺术成绩和创作风格,作者自认为不值得一提。但正是在该书的《娟子姑娘》和《花梦》等篇中,孕育着施蛰存的小说心理分析倾向的萌芽。在现代都市社会的背景下,揭示隐藏在人们心灵深处那种难以见人的情欲与变态心理的表现,趋于暴戾乖张的性格和变态行为,成了施蛰存关注现代人精神世界的独特的文学视野。

《上元灯》被作者当作第一部创作而倍加珍惜。书中多属感音伤怀的记旧之作,表露出朴素、清新的写实文风,和精致的散文笔调。但就其与心理分析小说的特色之关系而言,作者将细腻的内心理感觉和曲折委婉的情绪表达与潜意识中性欲的表现结合起来,在表现暴戾乖张的变态性心理方式之外,对另一种清新优雅、精细入微、绅士式的缠绵情调作出了尝试(《梅雨之夕》)。

从《将军底头》开始,施蛰存才真正形成现代

主义意义上的心理分析风格,并在短短几年内便达到艺术的顶峰。从他小说的题材和风格来看,他的心理分析分别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是历史题材和现代题材的心理分析小说。侧重于表现变态性心理和精神缺损型的焦虑恐怖心理。这种表现病态人格的描写,往往带有癫狂、怪诞和神秘的倾向。第二,是以家庭、夫妇生活为主体的“私人生活琐事”的描写,比较集中于对女性心理的细致分析。由于多是写实式的观照,故作品内容与风格都比较纯正。作为前者,有以《石秀》为代表的历史题材小说(《将军底头》),和以《梅雨之夕》为代表的现代题材小说(《梅雨之夕》);作为后者,有以《妻之生辰》为代表的“女体习作绘”现实小说(《梅雨之夕》);作为后者,有以《妻之生辰》为代表的“女体习作绘”现实小说(《善女人行品》)。

(一)《将军底头》,历史题材与心理分析

《上元灯》的清新风格,赢得了当时文学界许多“奖饰”。施蛰存因此而想写一点更好的作品出来,立志在创作上“独自走一条新的路径”。②首先,他把创新的眼光落在“应用旧材料而为新作品”③的历史小说形式上,《将军底头》收有《鸠摩罗什》、《石秀》、《将军底头》和《阿谥公主》四个历史题材短篇这是他正式尝试运用心理分析方法到文学中来的一个开端。

在充满浓厚浪漫传奇色彩的历史小说中,施蛰存精心表现了“二重人格”,即社会道德规范与生命本能冲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弗洛伊德对于性欲

①钱杏村:《一九三一年文坛之回顾》,《北斗》2:1 1932年1月。

②③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载《创作的经验》,天马书店,1933年6月。

的作用有其夸大的见解，认为“上至天国，下达地狱，处处都与性欲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只是在社会环境条件和意识理性的制约下受到各种压抑，于是便不时会以变态的行为方式暴露出来。施蛰存所表现的“二重人格”，正是自觉地对理智与本能、人性与兽性的强烈冲突所给予的集中反映。在他的笔下，鸠摩罗什是一位自信“有定性”的大德僧人，但即使长期有“壮严的仪态”却也无法六根清静，表现出宗教戒条与性欲冲动的冲突。带兵征讨土藩的将军花惊定，迷上美貌的村女，无以自拔，在自定的军法纪律与性欲本能之间陷入深深的矛盾，表现为一种信义与性欲的冲突。而梁山好汉石秀，则在为人之客时私恋义兄之妻，违背了传统的伦理教义，表现为友谊与性欲的冲突。由此可见，性欲的本能冲动，成了施蛰存写作历史小说的中心内容。

当然，施蛰存对“二重人格”的刻划，并不是以自然主义的描述来具体展览性行为，流于色情的庸俗情调；而是反复强调性欲受到压抑后一种强烈而扭曲的反常心态，以及在理智与本能的激烈冲突时，复杂而微妙的内心活动。就人物的心理行为而言，他们始终处于矛盾之中，得到了一种结果，便会失掉另一种结果，无法取得心理上的平衡。在鸠摩罗什吞针而受阻，花将军提着自己的头颅飞马来见村女的情节里，除了佛术、箴言等神秘色彩的渲染之外，还深刻表现了这种两难冲突因果报应式的必然结局。在这些描写中，施蛰存对人物性欲本能以及变态行为，作出了合乎弗洛伊德学说的解释，显示出在心理分析上独特的艺术才华。

施蛰存历史小说中的心理刻划是多层次的。他在心理分析中侧重性心理分析，在性心理分析中侧重变态性心理分析。就此而言，《石秀》的表现技巧和艺术特征更为突出。小说把人物心理矛盾与行为冲突写得波澜曲折：先是由对潘巧云的情欲上的爱恋与对杨雄道德上的不义之感产生心理冲突，接着又在潘巧云与海和尚私通的刺激下萌发性狂暴意识，“因为爱她，所以要杀她”，最后以杀人和对尸体、鲜血的欣赏来获取畸形的性欲满足。心理变态的多重性，复杂性，使人物心理塑造更加鲜明生动。《石秀》的出现，表明施蛰存表现变态性心理的艺术探索，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在此，作者所力图反映的，是古人的形骸与现代人的精神的融合；或者说是以现代的性心理理论为指导以心理分析方法来解释历史故事。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故事新编”。

即使人物思想、语言和行为忠实于历史真实，又以现代人现代情绪的表现形式来刻画心理冲突。这种古今结合的方法，确实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手法。就其艺术特色来看，也是成功的。

但同时，历史小说也随着《石秀》艺术地位的确定而到了尽头。后来的《阿谿公主》和《李师师》只成了这一题材的余波。毕竟这是一种过于狭窄的闭门造车式的创作，即使在当时，作者也有过望难却步的经历。①正如批评者指出的那样，“二重人格”已经不能再写了。作者需要在心理分析的探索中去开辟新的支路。

（二）《梅雨之夕》：现代题材与心理分析

《梅雨之夕》，出现了从历史故事到现代生活的题材转换。

对施蛰存来说，反映现代社会中现代人的情绪和感情，是一个根本的创作指导思想。对此，历史题材的适应性毕竟是有限的；而《上元灯》所反映出的个人气质与情调，表明他更擅长于表现以细腻、平实和体验深刻为特色的“私人生活的琐事”。即以《将军底头》而言，虽然鸠摩罗什经学渊博，禅功甚深，花将军官位最高，但在变态心理的描写上甚为成功的，却还是石秀这样的梁山好汉，一个善恶相兼，人格缺陷的普通人。可见，他由《梅雨之夕》开始，将艺术视野转向贴近现实社会的中低层市民，和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心理波动，正是其笔力所逮的必然趋势。

当他把笔触重新投向现代社会平凡人生的精神世界时，原有的清新朴素的笔调和细腻精微的情绪体验等特色有了更大的施展余地。同时又以其心理分析方法的丰富发展，揭示出各种变态的，怪异的心理现象，为现代主义文学开辟了一个相当特殊的精神领域。

《梅雨之夕》，是施蛰存将现代题材与心理分析相结合的一篇重要的代表作。它先载于《上元灯》（1930），后又改为同名集子（1933）的首篇。小说描写的是在一个梅雨淅淅的黄昏，下班回家的“我”遇到一位未带雨具的姑娘，不禁被她美貌吸引，鬼使神差地主动伴送她回家。小说的情节、人物极其简单，通篇都是“思想底独白”，却表现出小说人物心理活动的层层波澜。全篇都从性

①创作《鸠摩罗什》发表后，施蛰存曾想再写《达摩》和《释迦牟尼》，将宗教与性欲结合起来，“结果是一句也不敢落笔”。

的吸引力这一潜意识出发,打开人物隐秘的心扉,表现出微妙的人际关系和人生意义。

《梅雨之夕》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它正式形成了施蛰存反映现代人现代情绪时独特的风格:注重心理刻画,通篇地以内心独白为叙述的主体;作品不偏重故事情节,常常只是个人私生活的一个断片。其次,还表现为虽然集中揭示潜意识里的性心理和性幻觉,却同时洋溢着一种舒展雅致的清新格调,使画面与意念都含有艳而不俗的分寸感,保持了心理分析中的纯净化,具有较高的艺术魅力。

施蛰存的心理分析还伸向了心理变态、人格缺陷的精神领域。他在《石秀》中所表现的因爱恋而杀人的暴戾性心理和欣赏尸体鲜血的虐待狂心态,实际上已在实践这样的意图。与此同时,他还写下《在巴黎大戏院》和《魔道》等小说,正式进入“变态的、怪异的心理小说”的创作阶段。

变态性心理,是在性欲本能受到长期的或强烈的压抑,而无法正常宣泄或得到升华时,出现的一种病态心理。它常常以冲破社会规范的反常行为表现出来,或者是暴戾的攻击、或者是猥琐的刺激。

《在巴黎大戏院》刻画小说人物坐在影院却专注于身边女友,从嗅到的女性肤气、香气引出“撕裂”的感觉直到以吮吸女友手帕中的汗味痕迹而自慰的变态心理。而以《魔道》为代表的一批人物,他们长期承受着紧张与压抑的精神负担,逐渐形成抑郁或焦虑的性情,又常常表现为莫名其妙的害怕、妄想、顾虑或恐惧。在精神病学上,是一种精神缺损型的神经性焦虑症状。《魔道》中患“怔忡症”的人物,对火车对座的黑衣老妇产生恐惧,时时觉得难以摆脱这个“魔影”的纠缠;《旅舍》中丁先生夜宿客栈时庸人自扰;以及《夜叉》中主人公对幻化出的白衣女妖,交织着色欲的冲动与妄想的猜疑。这些作品,在对恐惧、怪异等病态心理的揭示中,流露出一种神秘、荒诞的倾向。

就这种病态精神现象的艺术表现来说,施蛰存仍保持着一种缜密而细致的作风。无论是人物心理的表达上,还是环境氛围的处理上,他都很注意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和因果关联,从而在整体上达到颇具说服力的感染效果。尤其在作为小说背景的自然环境描写上,作者总偏爱于一种昏沉阴暗的色调。如街头雨中夜色,影院暗中场景,天色幽暗的车厢,灯光暗淡的“旅舍”乃至“薄暮中的舞女”和“宵行”途中的木匠,等等,明显体现着作者对小说意蕴的一种追求。在幽暗环境中,外界的压抑力量相对减弱,人物潜意识与幻觉就显得较为活

跃,更利于引出飘忽迷朦,隐约含混的神秘感觉,从而在集中的氛围感染中表现出细致的艺术魅力。

因此,就其极为用心的探索实践来看,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确实达到了揭示病态心理乃至病态人生的一定深度,表现了现代精神世界的隐秘的一角。但这种倾向,又带着明显的偏颇。首先是过多注重于性本能冲动和变态怪异心理的揭示,缺乏更为广泛的社会人生意义和审美价值;毕竟在现代社会现代人的心态情绪中,还有更加广阔的天地。其次是有些描写过于强调性心理与恐怖神秘感的揉合,而失去分寸感,露出不合情理的败笔。这显然应从作者的创作意图上来找原因。作者自认,等到从《魔道》写到《凶宅》时,他自己也“实在是已经到魔道里去了”。^①这个评价可以看成是作者对专注于变态心理文学倾向的一种自我反省。

(三)《善女人行品》:女性心理“习作绘”

也许,从生活真实感受和经验来说,《善女人行品》中的一组小说则更贴近施蛰存的世界:多是都市社会里中下层市民日常生活的实际写照。正是在这里,施蛰存摆脱了变态怪异心理小说中的诡秘情调,而以凡俗的视野,细致的笔法,朴素的文风,写实的格调,来表现私人生活琐事和女子心理的分析。其机智的笔锋甚至还通过善意的调侃和辛辣的讽刺,表现出一种社会批判的眼光。

如果我们注意到施蛰存将曾收入《上元灯》的《妻之生辰》重又编入《善女人行品》集里,就可以发现他对这一类以个人生活体验为主的作品的重视。《妻之生辰》表达了丈夫无钱为妻购回生日礼品内愧的心情。类似这种夫妇间因细微小事而引身体贴爱恋情感的故事,还有,《菀菜》、《残秋之下弦月》等篇。这些小说都有相同的情感模式:夫妇间生活琐事——丈夫的疏忽——丈夫的醒悟,深情而带内疚。从而组成了施蛰存的“夫妇三部曲”。尤其是《妻之生辰》,在主题,情节和格调上,与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有很多相似之处。另外,在《春阳》、《狮子座流星》和《雾》等篇里,作者的心理分析主要是通过女主角自身的遐想、梦幻和潜意识的心理矛盾而得以揭示。作者在设置情节和建立因果联系方面,手法更为娴熟,真实而多角度地反映了特定身份的女子心理,增加了符合生活逻辑的现实成分,因而表现出较好的分寸感。而在阿秀不甘为妾而逃婚再嫁的抗争中(《阿秀》),在特吕姑娘以其优质服务为商店赢利,却反

^①施蛰存:《梅雨之夕》自跋,新中国书局1933年。

被同事中伤的丑陋心态揭示中(《特吕姑娘》),则已蕴含了在施蛰存作品中难能可贵的社会批评意识。可惜,这种批评始终只是一种点缀,而未能在他作品中产生更大的影响。

在这些作品中,施蛰存的两性道德观和审美判断总表现为:他将更多的同情、赞美留给女性,而对男性则多加以严厉的讽刺与批判。也许这正是施蛰存冠以《善女人行品》之名的始愿。

从这种尊重女性、维护女性的观念出发,施蛰存在心理分析,她始终注意体验和发掘女性的细腻心理,并将之作为一扇观察人生的重要窗口。在男性世界的变态、怪异、暴戾、猥琐,和女性世界的贤惠、深情、娇爱、温柔等对比描述中,作者已脱离了弗洛伊德的藩篱,而从人生意义上获得了新的进展。这种对于大男子主义等社会风气的批判,和对于中国妇女所受到深一层压抑的揭示,还是比较切合反封建的历史主题的。正是由此出发,施蛰存才在新的人生意义和对妇女命运的思考中,走向现实主义。

二、施蛰存与显尼志勒

施蛰存所接受的西方文学影响,是多方面的。作为一个诗人,他钟情于英国浪漫诗歌和美国意象派;作为一个作家,除了弗洛伊德学说之外,田山花袋的自然主义思潮和爱伦坡的神秘主义都给他留下了浓浓淡淡的痕迹。但就心理分析小说而言,对他影响最深的,应推奥地利作家显尼志勒。

亚瑟·显尼志勒(Schnitzler)出生于维也纳的名医世家,曾以医学博士学位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成为一名喉科医生。后来,他象契珂夫那样,弃医治文,发表了一系列戏剧、短篇和长篇小说。

显尼志勒擅长以性爱为主题来表现维也纳的生活场景。在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中,他常常以生与死、女性的善良与男性的卑劣的对立关系来展现生活矛盾。他既相信爱是支配人生的主要力量,同时又悲哀感到死与他人是爱的强敌。在对人类命运持一种怀疑论的人生哲学影响下,缓缓诉说着一个个美丽而忧伤的爱情的悲剧。独特的内心独白样式和清新优雅的文风,使显尼志勒的声望在德语文学圈里日益增高。

三十年代初期,显尼志勒逐渐为我国文坛所了解。他的一些重要作品都集中在这一段时期里先后翻译介绍进来。如《阿那托尔》(郭绍虞译,商务,1928)、《恋爱三昧》(即《爱》,赵伯颜译,乐群)、《苦恋》(刘大杰译,中华,1932)等。施

蛰存所主持的水沫书店出版了《牧人之笛》(施蛰存译,1929),和《循环舞》(赵伯颜译)等显氏的剧作。施蛰存本人也由喜爱进而动手翻译,出版了多部显氏的小说。其中主要有显氏篇幅最巨的长篇小说《薄命的戴丽莎》(中华,1937),有代表短篇最高成就的《爱尔赛小姐》^①和《少校哥斯特尔》、有生动反映妇女恋爱心理的长篇《多情的寡妇》(尚志)。另外还有《维也纳牧歌》等译作,未有机会印出就在抗战中毁于战火。

施蛰存对显尼志勒有过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显氏在文学创作中注重性心理分析的成功,是可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相比美,或者说弗氏学说只有经过显尼志勒在文学上的实践,才可作为一条创作的新路,广泛传播到欧洲现代文艺中去。同时,他还指出现代主义文学名作《尤利西斯》等所应用的内心独白形式,早在显氏的中篇小说中便有过成功的运用。^②施蛰存俨然把显尼志勒看作心理分析小说重要代表。联系到他热衷于翻译显氏作品之际,正是他开始创作心理分析小说之时,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他后来还谈到,在接触到弗洛伊德理论和蔼理斯的性心理科学研究之前,他的心理分析方法“最初是从显尼志勒那里学来的”。^③

施蛰存为什么会钟爱于显尼志勒?又从中得到了哪些借鉴和启发?

首先是,显尼志勒的作品所透露出的维也纳情趣的吸引力。以约翰·斯特劳斯的圆舞曲而著名的维也纳,自十八世纪以来,便是艺术人才辈出的欧洲文化中心。多民族混杂使它在长期的互相影响中形成特有的国民气质,德国民族的阴郁,俄国民族的凝重、厚实,南欧民族的轻快明朗,它都兼而有之。文化历史与民族性格培养了维也纳文学的趣味,他们富有极其纤细的神经、敏锐的官能感觉和丰富细腻的感受能力。在他们的艺术观看来,“与其同残酷的时代精神相冲突而至于破碎,毋宁退于自己之中,体验周围的事物,捕捉在自己小小的经验之中映出来的时代精神的影像,在梦中……生存”。^④这与施蛰存追求的艺术情趣相同。幼时

^①后来施蛰存曾将此篇与《倍尔达·迦兰夫人》(即《多情的寡妇》)和《毗亚特利恩》合并为《妇心三部曲》,由神州国光社1931年出版。

^②施蛰存:《薄命的戴丽莎·序》,中华书局,1937年。

^③转引自《“心理分析”与中国现代小说》(余凤高著)P.20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④赵伯颜:《循环舞序》,《新文艺》1:3

在唐宋诗词艺术意境中的徘徊和早期创作中清新素淡的文笔,以及在狭窄天地间盛怀往昔、在反省遐思中讨生活等特点,初步形成了施蛰存灵巧、细致的文学风格。这些经验帮助他从小显尼志勒的文风情调中找到相似的呼应。他所欣赏并力求达到的,正是显尼志勒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微妙的欢乐,纤细的感情”、以及“科学者的精神分析”与“绅士底得意的文雅态度”的写作准则。^①有人曾将显氏为代表的这种维也纳文学趣味冠名为“薄暮情调”,^②意即黄昏时分,一位年青女子,心事萦牵,偷偷啜泣的情味。追忆与回顾、憧憬与想像、沉思与伤感,成了他们内心生活的全部内容。广义而言,在施蛰存笔下作着心理分析的女性,大都充满着“薄暮的情调”;相对于他们的行动来说,心理变化的过程显得更为重要。

其次,是文学表现上心理分析方法和内心独白形式的影响。这是显氏刻画女性性爱心理时最主要的表现方法,也在施蛰存的借鉴创作中取得了成功。他特别注意显氏描写性爱,“并不是描写这一种事实或说行为”,而是“注重在性心理分析”。^③这一观点划清了与自然主义方法的界限,因而使得他即使在描写变态性心理时,其基本态度仍是认真严肃的,与张资平、叶灵凤、邵洵美等人纯色欲的直接描写绝不相同。当然,至于“象劳伦斯那样,理直气壮地”写爱情与性欲,将之作为歌颂生命力的伟大创造精神而与资本主义虚伪道德相抗衡,作为一种生命哲学而加以提倡,自在施蛰存的心理分析中也是看不到的。在心理分析的文学观念上,他没有超过显尼志勒的世界。即使是从显尼志

勒那里学到的心理分析,也与“意识流”小说的艺术表现有所不同。后者由于受到詹姆斯心理学说和柏格森关于时空交错的理论观点的影响,而出现诸如《尤利西斯》和伍尔夫小说那样含义极广、处于自动、无序状态的意识流动表现。施蛰存接受了显尼志勒的表现特色,他的心理意识的开掘,总是围绕具体的事件和实在的人物,因而意识的对象与主题显得明晰、集中。

总之,施蛰存是由于共同的艺术情趣和表现的风格而接近了显尼志勒,甚至在多方面的借鉴学习中还恪守了显氏固有的立场、方法和眼光。作为一个例外,是各自文艺观所代表的哲学思想有所不同。显尼志勒的文艺观,是一种对于人类命运持怀疑论态度的人生哲学。因而在他忧郁的笔下,美好的事物与生命,总是遭受不幸,在爱与死的角逐中,代表善良与正义的女性总是蒙受灾难,乃至悲惨死去。这种对于妇女倾注了更多同情与爱心的艺术选择,也在施蛰存的创作里得到了呼应。但显氏上述的哲学观念,则使他超越了浪漫而轻柔的维也纳趣味,体现出一种忧郁的人道主义思想和严肃的人生批判态度。虽然这样的认识还不能帮助真正理解社会的实质,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通过文学观照,而上升到社会与哲学层次的理性思考。就此而言,施蛰存小说中仅有的一些社会批判,尚未达到如此的理性高度。

①②施蛰存:《妇心三部曲·序》,神州国光社,1931年。

③刘大杰《苦恋·序》,中华书局,1932年。

(上接第109页)

放,获得个性自由和人格独立。二、反对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和任何形式的专制统治,要求每个人和每个国家、民族都有生存、温饱发展的权利。三、反对一切反人性、反人道的行为,包括侵略战争,要求维护人的尊严,人的价值。鲁迅的这些观点,与中国现代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说发展,是说在鲁迅人生历程的不同历史阶段,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又不完全相同;在早期,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是“立人”。虽然他已注意到社会改革的重要性,但他还是把“立人”——“改造国民性”,即提高人的素质工作看作是第一位的工作。这是和他接受进化论和尼采思想的影响有关的,也是和启蒙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思想

结合在一起的。在中期,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是“生存、温饱和发展”。这里包括对人的要求和对民族的要求。他一方面继续把“改造国民性”一提高人的素质放在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他已看到变革社会制度,包括用革命的方式变革社会制度的重要意义了。他这一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和中国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相结合的。后期,鲁迅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为了无阶级社会”。他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是人道主义的理想社会,而把共产主义社会看作是人道主义的最高理想和最高境界。这是和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前途相一致的。显然,鲁迅这一时期的人道主义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人道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